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

张玉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渤海是我国唐至五代间, 由靺鞨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 包括朝鲜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边区在内的广大区域里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牡丹江流域是其统治中心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及墓葬出土的陶器为研究对象, 对遗址、墓葬所出器物分别进行类型学研究, 建立起了较为明确的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的编年与分期。从考古学上透视了渤海文化的形成过程及“海东盛国”的文化面貌。

关键词: 渤海; 牡丹江流域; 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渤海是我国唐至五代间, 由靺鞨族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 包括朝鲜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边区在内的广大区域里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渤海政权自 698 年大祚荣创建震国始, 至 926 年灭于辽, 存在 229 年, 其都城四迁四治。初都敦化, 天宝中以显州(今和龙西古城)为都, 天宝末迁至上京龙泉府(今牡丹江宁安渤海镇), 785 年又迁都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八连城), 794 年迁回上京直至灭亡。上京龙泉府两次为都, 时间最长。从都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 牡丹江中上游和海兰江—图们江流域是渤海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

牡丹江流域是渤海政权的统治中心之一: 渤海初都之地敦化位于牡丹江上游, 两次为都的上京龙泉府位于牡丹江中游。在他们周围, 分布着大量不同阶段的渤海遗迹, 考古发掘工作也开展较好: 起步于 20 世纪初^[1], 解放后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2], 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渤海墓葬^[3]得到了系统发掘, 遗址^[4]也得以大规模揭露。

牡丹江流域渤海考古学材料尤其是出土陶器数量的激增及大量刊布, 为这一区域渤海陶器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使得有关渤海陶器分期的线索日趋清晰起来^[5]。2001 年, 《河口与振兴》^[6]报告的出版, 发表了一批有叠压打破关系的考古单位和渤海陶器材料, 使我们有条件对渤海陶器的典型器物进行更细致的形制分析, 以进一步明确渤海陶器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以牡丹江流域渤海遗迹出土的陶器为研究对象, 对遗址和墓葬所出器物分别进行类型学研究, 在此基础上将两者对比分析, 并吸收相关研究成果, 初步建立起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的分期与编年标尺, 并希望此研究成果能够对渤海陶器的分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

二、遗址出土陶器的形制分析

1、出土陶器及其遗址的介绍

牡丹江流域的渤海遗址经发掘出有陶器并已发表材料的有振兴遗址、河口遗址、渡口遗址、上京龙泉府遗址、细鳞河遗址、石灰场遗址和木兰集东遗址等 7 处^[7]。其中, 振兴遗址有较丰富的自靺鞨至渤海这一年代区间内的文化遗存。本文的分析, 拟从振兴遗址的分组入手, 首先确立一个靺鞨—渤海文化代表性遗存的初步编年序列, 以作为其他遗址分析的年代标尺。

《河口与振兴》^[8]报告指出: 振兴遗址四期文化遗存中的 20 个灰坑和 3 座房址, 存在叠压打破关系。其中出土了陶器的单位主要有以下几组叠压打破关系: H7→H27→F4; H12→H15; H14→H28;

H94→F10。报告据出土遗物的同异，将四期遗存分为顺序的3组：第一组以F4为代表；第二组以H27、H14、H15、H17等单位为代表；第三组以H7、H94、F10等单位为代表。发掘报告据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及陶器组合关系的变化将五期遗存也分为顺序的3组：第一组以第2层及打破该层的H6为代表；第二组以G2、ⅢH10为代表，G2开口于第1层下，被F17打破，打破第2、5层，ⅢH10开口于第1层下，打破第2层；第三组以H153、H155、ⅢH11为代表，H155被H159打破，三者均开口于第1层下，打破第2层。

从振兴第四期和第五期文化遗存所划分的六组遗迹出土的陶器来看，以深腹罐、鼓腹罐和盆器形变化最为明显。深腹罐、鼓腹罐虽形态多样，但主要变化特征却基本一致，即由矮胖向瘦高发展；各型盆口部均呈现逐渐上抬的趋势，相应地口部逐渐外张。对照发掘报告提供的层位关系，上述六组遗存的序列应当是合理的。故而本文采用这一分组结果，作为牡丹江流域靺鞨—渤海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性遗存。并将第四期、第五期早晚相承的六组遗迹分别称为振兴1—6组。

总体上看，河口遗址、渡口遗址、上京龙泉府遗址等^[9]的分期结果，均能与振兴遗址的六组基本对应，可将上述诸遗址靺鞨—渤海时期遗存归纳为六个发展时间组（表一）。

表一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分组对应表

遗址 分组	振兴	河口	渡口	上京
六	6			√
五	5		四期	√
四	4			
三	3			
二	2	四期	二期	
一	1			
备注	√表示该遗址有此组器物			

2、典型陶器的形制分析

在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深腹罐、鼓腹罐、盆等器类数量多，各遗址也均能见到，这些陶器有清晰的逻辑演变规律可循，本文将其作为分期断代的典型器物。

深腹罐是渤海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多为夹砂褐陶，仅见少量的灰陶或其他陶系。多为手制，很多器物表面经过打磨。器表装饰比较简单，除普遍在口沿下施压印的附加堆纹外，器物肩、腹部施纹者较少，纹样有圆点、三角形和条形等。

从颈部、腹部等部位的差异来看，深腹罐可分为五型。

A型 有明显束颈。此型深腹罐最为常见。按颈部的形态又可区分为两种亚型。

Aa型 颈部较长。依腹部及口部变化可分四式。I式，标本振兴（指振兴遗址，下同）F4:4→II式，标本河口（指河口遗址，下同）T1002③:2→III式，标本振兴H94:1→IV式，标本振兴H6:1。演变规律：束颈越来越不明显，鼓腹程度由大变小，腹径由大于口径渐变为小于口径，器身由矮粗渐变为瘦高。口沿下的装饰也由贴附泥条的堆纹逐渐变成捏塑的凸棱。

Ab型 颈部较短。依腹部及口部变化分三式。I式，标本振兴F4:3→II式，标本振兴H27:1（图二，6）→III式，标本振兴H7:4。演变规律：基本同于Aa型，但腹部由鼓腹变为弧腹的发展趋势较前者更为明显。

B型 形体普遍较大，高度约30—40厘米，腹部微下垂。依颈部及腹部变化，可分三式。I式，标本河口F1001:3→II式，标本振兴F10:1→III式，标本振兴H153:3。演变规律：口部由大变小，束颈程度不断加大，腹部由弧腹向鼓腹演变。腹径由约等于口径变为大于口径。纹饰变化同A型。

C型 长颈，大敞口。未见完整器形。依颈部变化可分三式。I式，标本振兴T1501②:13→II

式，标本振兴 H6:3→Ⅲ式，标本振兴 H155:10。演变规律：束颈越来越不明显。纹饰变化同 A 型。

D 型 侈口，高领。均泥质，呈褐色或灰色，轮制。标本渤海镇（指注释 2g 中发表的材料，下同）T117:5。

E 型 无颈部，深腹。均泥质，呈褐色或灰色，轮制。标本上京房址（指注释 4b 中发表的材料，下同）F1:7。

从上述五型深腹罐的分式情况看，它们尽管在局部的变化特征上表现得不甚一致，但器身由矮胖渐变为瘦高，即腹径与高的比例越来越小则是其普遍的演变规律；口沿也都有逐渐抬起即沿下角逐渐增大的发展趋势。从口沿风格观察，口沿下的装饰也由贴附泥条堆纹逐渐变成后来的由器物表面挤捏出凸棱。

鼓腹罐也是较常见的器类，可能是由于形体较大，往往可复原器物缺失也较多，完整器较少。多为泥质灰陶、极个别为褐陶。多轮制。鼓腹罐以素面为主，内外壁多经打磨，有些陶器表面饰凹弦纹、凸弦纹和磨压形成的暗纹。

根据口部、颈部、腹部等部位的差异，可分为三型。

A 型 卷沿，无领，形体普遍较大。无完整器形。可分三式。I 式，标本振兴 T2103②:12→Ⅱ式，标本振兴 G2:11→Ⅲ式，标本振兴 H155:6。演变规律：沿面向外翻卷的程度逐渐加大。

B 型 有肩，矮领，斜弧腹。依肩部变化可分三式。I 式，标本振兴 F17:1→Ⅱ式，标本振兴 H156:3→Ⅲ式，标本渡口（指渡口遗址，下同）H2:4。演变规律：矮领逐渐消失，由鼓肩发展为圆肩。

C 型 翻沿，椭球形腹。依腹部变化可分三式。I 式，标本振兴ⅢH10:1→Ⅱ式，标本渤海镇 T302:100→Ⅲ式，标本渤海镇 T306:246。演变规律：鼓腹程度由大渐小，器身由矮胖发展为瘦高。

盆是一种重要的盛贮器，数量很多。以泥质灰陶为主，个别为夹砂褐陶。多素面，有的器物腹部有弦纹或磨压暗纹，也有的器物腹部有两个对称的横耳。

依据腹部形状可分三型。

A 型 卷沿，鼓腹，平底，多有对称横桥耳。数量较多。依据最大腹径与通高的比例关系分两个亚型。

Aa 型 宽沿，深腹。依据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三式。I 式，标本振兴ⅢT1②:2→Ⅱ式，标本振兴 G2:1→Ⅲ式，标本振兴 H153:1。演变规律：鼓腹程度逐渐变小；腹深不断增大；腹部有双横耳的，双耳的位置由位于器身上部变为居于器身中部。

Ab 型 窄沿，浅腹。依据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二式。I 式，标本渤海镇 T302:66→Ⅱ式，标本渤海镇 T311:12。演变规律：同 Aa 型盆一致。

B 型 口部外张，弧腹，无耳。均残，依据腹部变化可分二式。I 式，标本振兴 T1004②:4→Ⅱ式，标本振兴 H153:4。演变规律：腹部由微鼓到弧腹。

C 型 厚圆唇，折腹，平底。依腹部的变化可分三式。I 式，标本振兴 T1002②:13→Ⅱ式，标本振兴 H131:1→Ⅲ式，标本上京房址 F1:8。C 型盆形制演变趋势：折腹越来越明显，最大腹径由小于口径变为略等于口径；腹深逐渐变小。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陶器器形很多，除了上述深腹罐、鼓腹罐和盆等分期标准器之外，还有盘、器盖、壶、瓶、敛口罐、甑、三足器等。这些器物在器形和制作技术上都与渤海的传统陶器不同，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虽然其形制演变多无规律可循，但这些器形的出现和普及，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渤海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

3、分期

以上对典型器类的形制分析表明，不同型别的器形，往往在形制演变上都有相同的规律可循；各类型器物的式别变化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层位关系的验证。故这些器物将作为文化遗存分期的指征性器形。通过共存关系，部分非典型器物亦可作为遗存分期的指征性器形使用。将对典型器

物的类型学分析结果和有共存关系的非典型器物置入振兴 1—6 组当中，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陶器形制演变序列，则如表二所示。

表二 陶器在各年代组中的分布情况表

类型 分组	深腹罐					鼓腹罐			盆				
	A		B	C	D	E	A	B	C	A		B	C
	a	b								a	b		
六				III		√	III		III	III	II	II	III
五					√		II	III	II	II	I		II
四	IV		III	II			I	II I	I	I		I	I
三	III	III	II	I									
二	II	II	I										
一	I	I											
备注	√ 表示该年代组有此型器物												

表二续

类型 分组	盘	器盖	壶	瓶	甗	三足器
六	√	√	√			
五	√	√	√	√	√	√
四						
三						
二						
一						

从表二所示情况看，已分型陶器的多数型别在前文归纳出的六组遗存中，形制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据此，可将前述六组遗存视作牡丹江流域靺鞨—渤海遗址出土陶器由早至晚顺次演变的六个发展阶段。

第一段：典型器物有 Aa I、Ab I 式深腹罐。遗迹只有振兴 F4 属此段。此段出土陶器数量非常少，均为夹砂褐陶，手制。器形单一，整体特征为鼓腹明显，器物较矮粗，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

第二段：典型器物有 Aa II、Ab II、B I 式深腹罐，同时还共出有碗和钵。振兴 H17、H14、H15、H27，河口 F1002、F1001，渡口 F6、F11、F9 等单位均可归属此段。从陶器整体特征来看，此段以夹砂褐陶为绝大多数，仅有个别的泥质褐陶。器物表面除素面和磨光外，大部分器物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手制。典型器物中，深腹罐有 A、B 两型，其中 A 型多于 B 型。A 型深腹罐腹部变深，腹径与口径大体相当，形体较瘦长。B 型形体较大，其他特征同于 A 型。实圈足碗的口沿下也饰一周刻齿状附加堆纹。

第三段：典型器物有 Aa III、Ab III、B II、C I 式深腹罐。振兴 H7、H94、F10 等单位属于此段。陶器仍以夹砂褐陶为主，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器表多经磨光。典型陶器中，A 型深腹罐数量仍是最多，B 型数量其次，C 型较少。器物的口沿下仍贴附泥条堆纹，但口沿上抬即沿下角有所增大。A 型深腹罐腹部瘦长，腹径小于口径。B 型深腹罐腹部外鼓，腹径大于口径。

第四段：典型器物有 AaIV、BIII、CII 式深腹罐，A I、B I、B II 式鼓腹罐，Aa I、B I、C I 式盆。共存有钵。振兴②层、H6 等单位归属此段。此段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少量。大部分器物表面经磨光。深腹罐口沿下的附加堆纹已被凸棱代替。典型器物中深腹罐继续存在，但不再是主要器形，数量也不多。A 型深腹罐弧形腹，腹径明显小于口径，沿下角更大。此段新出现各种型别的鼓腹罐和盆。

第五段：典型器物有 D 型深腹罐，A II、BIII、C II 式鼓腹罐，Aa II、Ab I、C II 式盆。共存有盘、壶、瓶、甑、三足器、碗、钵等。振兴 G2、IIIH10，渡口 H1，上京 97 年（指注释 4c 中发表的材料，下同）I G3、II J，渤海镇 T302 等单位可归属此段。此段的碗与二段有很大不同，圈足碗的口沿下没有附加堆纹的装饰，也没有器壁内曲的碗。

该段灰陶器成为主流，褐色陶不多。轮制陶器数量明显增多，很多器形较大的鼓腹罐、盆都是轮制的。典型陶器中，几乎见不到深腹罐。鼓腹罐流行卷沿。A 型盆的腹部出现对称的横桥状耳，鼓腹程度变小，口径与腹径相若。盘、壶、瓶、三足器等是新出现的器形，具有浓厚的中原地区器物风格。

第六段：典型器物有 CIII 式、E 型深腹罐，AIII、CIII 式鼓腹罐，AaIII、Ab II、B II、CIII 式盆。共存有敛口罐、盘、器盖、壶、碗、钵等，它们具有中原地区器物特征。振兴 H153、H155、IIIH11，上京房址 F1、T1②，渤海镇 T306、T311 等单位均属此段。

此段的陶系比例基本同上段。褐陶器的数量更少，只有 CIII 式深腹罐等少量标本。这一段，盆、鼓腹罐的器身普遍比较深。A 型鼓腹罐唇面向外翻卷的程度加大，B 型鼓腹罐矮领逐渐消失，由圆肩发展为溜肩，C 型鼓腹罐鼓腹程度由大渐小，器身由矮胖发展为瘦高。A、B 型盆鼓腹程度均变小，口部均外张。腹部有双横耳的，双耳的位置也由位于器身上部而变为居于器身中部。C 型盆折肩更明显，腹径由小于口径变为略等于口径。

从以上分析看，所分六段中第三段与第四段，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的变化较大。第三段与第四段相比，A、B、C 型深腹罐均发生了变化。Aa 型深腹罐由 III 式演变为 IV 式，Ab 型深腹罐消失；B 型深腹罐由 II 式演变为 III 式；C 型深腹罐由 I 式演变为 II 式。从第四段开始，新出现鼓腹罐和盆，并成为陶器中的常见器形。而且，从陶质和制陶技术上来看，第一、二、三段绝大多数为夹砂褐陶，泥质陶数量很少，器物多手制。第四段开始，泥质陶无论是数量还是器类都大大超过了前三个阶段。轮制技术得到普遍应用，深腹罐口沿下的刻齿状附加堆纹，也因制陶技术而变为捏塑的凸弦纹。

将第五段与第四段相比，差别同样较大。除典型器物的形制变化之外，A、B 型深腹罐都已不见，出现 D 型深腹罐，深腹罐总体上看已十分少见；各种类型的鼓腹罐和盆开始流行；鼓腹罐流行卷沿；A 型盆的腹部出现对称的横桥状耳；该段灰陶器成为主流，褐色陶不多；轮制陶器数量明显增多；盘、壶、瓶、三足器等是新出现的器形，具有浓厚的中原地区器物风格。

第一段到第三段、第五段到第六段表现出了更多的共性。第一—三段，器形主要都是深腹罐，仅共出有少量的碗。陶器均以夹砂褐陶为主，有个别为泥质褐陶；绝大部分为手制；器物表面除素面和磨光外，大部分器物口沿下贴附泥条堆纹。第五段和第六段，都只见少量的深腹罐，鼓腹罐和盆是主要器形，盘、壶、瓶、器盖、三足器等具有浓厚中原地区器物风格的器形在两段中均常见到。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不多。大部分器物为轮制。

考虑到以上各段主要器物特征的延续性与差异性，可将上述六段划分为发展变化更加明显的三个时期。其中，第一、二、三段可合并为第一期，第四段为第二期，第五、六段可为第三期。

4、年代

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出土陶器各期年代的推定，离不开渤海国的历史发展轨迹。渤海从第一代高王大祚荣（698—719）建国，第二代武王大武艺（719—737）发展，到第三代文王大钦茂（737—793）开始走向繁荣，奠定了渤海国稳固的基础。期间，唐王朝于公元 713 年派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以持节宣劳靺鞨使的名义，前来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之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10]。渤海是唐朝的蕃国，同时也是唐朝的羁縻府

州，自此加强了和唐王朝的联系。成王于 794 年还都上京龙泉府。渤海由于其内部的夺权斗争，经历了短暂的相对停滞，宣王大仁秀（818—830）时，开始走向中兴，到了大玄锡（871—894），进入极盛时期，被誉为“海东盛国”。此后渤海走向衰落，公元 926 年契丹攻陷渤海国都上京龙泉府，渤海国灭亡。

关于上京龙泉府遗址是渤海后期遗存，现在看来是毫无异议。该遗址的出土器物均处于第三期，故第三期的年代是渤海后期，其上限是上京龙泉府第二次为都以后，即公元 794 年，下限至渤海灭亡即公元 926 年。

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器物形制的变化程度最大，结合历史记载，渤海在受册封之后与唐王朝的联系逐渐增多，开始更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上我们推断第一期的年代为渤海建国前后，其下限是唐王朝对大祚荣的册拜即公元 713 年。处于第一期第一段的振兴遗址 F10 内出土的木炭标本碳十四数据为距今 1530 ± 60 。因此，第一期的年代延续的时间可能较长，包括了渤海建国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由于第二期的器物与第一期器物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所以，第二期的年代在渤海前期，其上限为第一期的下限即公元 713 年，下限为第三期的上限即公元 794 年。

渤海文化是以靺鞨文化为主体，兼容了其他民族或地区的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在其建国以后。文王大钦茂在位时期，更形成了向唐王朝学习的高潮。从上述总体分期所展示的阶段特征看，各期段之间虽然变化的程度有大有小，但都是渐变的。深腹罐、鼓腹罐、盆等典型器类中的主要型别都有清晰的演变脉络。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的变化程度最大，这恰恰在考古学上说明了渤海建国前后文化上的变更。从更大的空间范围看，第二、第三期的深腹罐、鼓腹罐、盆、盘、壶、瓶组合，已经成为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最为鲜明的特征。

三、墓葬出土陶器的形制分析

牡丹江流域的渤海墓葬经发掘出有陶器并已发表材料的有六顶山墓地、虹鳟鱼场墓地、羊草沟墓地、石场沟墓地、二道河子墓地、北站墓地等 6 处^[1]。在这 6 处墓地中虽然均无可以利用的层位关系，但是墓葬出土陶器在器形、陶质、陶色等方面与遗址出土陶器均显示了相当的共性，为两种不同性质遗迹出土的陶器进行对比分析提供了前提。我们拟以遗址的分段结果为基础，先将墓葬出土陶器进行形制分析和分段，通过与遗址分段的对比，确立他们在陶器排序中的相对位置，再进行分期。

1、典型陶器的形制分析

在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深腹罐数量最多，是各墓地的主要随葬器物，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一样，他们在基本形态一致的情况下，局部或整体上又有一些细微的渐变规律可循，可以作为分期断代的典型器物。

深腹罐是渤海墓葬出土陶器中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器类。数量上占据着陶器的主体。多为夹砂褐陶，仅见少量的灰陶或其他陶系。多为手制，很多器物表面经过打磨。多素面，口沿下有一周凸棱形成重唇，有的器物肩、腹部饰有弦纹。从颈部、腹部等部位的差异来看，深腹罐可分为五型。

A 型 器身瘦长，翻沿，平底。依据口部及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三式。I 式，标本海林北站（指海林北站墓地，下同）M3:1→II 式，标本六顶山（指注释 2g 中发表的材料，下同）M205:5→III 式，标本虹鳟鱼场（指虹鳟鱼场墓地，下同）M2205:15。演变规律：鼓腹程度渐小，翻沿逐渐竖起，口部不断张大。

B 型 束颈，微鼓腹，平底，底径相对较大。依据腹部的变化可分三式。I 式，标本石场沟（指石场沟墓地，下同）M18:2→II 式，标本石场沟 M12:2→III 式，标本石场沟 M16:4。演变规律：鼓腹程度渐小，口沿逐渐竖起，口部不断张大。

C 型 卷沿，短束颈，鼓腹，平底。依据腹部及腹径与口径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分三式。I 式，

标本羊草沟（指羊草沟墓地，下同）M117：7→Ⅱ式，标本石场沟 M5：2→Ⅲ式，标本石场沟 M3：1。演变规律：鼓腹程度渐小，卷沿逐渐竖起，口部不断张大。

A、B、C 型深腹罐有着相同的演变规律：鼓腹由明显到不明显，腹径由大于口径到约等于或小于口径，口部逐渐上抬即沿下角逐渐增大。

D 型 斜直领，器身较矮，器壁厚，平底。标本虹鳟鱼场 M2205：1。

E 型 长腹较直，下腹略斜收，颈腹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平底。标本羊草沟 M104：4。

鼓腹罐：是墓葬中仅次于深腹罐的随葬器形。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均有。根据口部、颈部、腹部等部位的差异，可分为两型。

A 型 束颈，颈部较粗，鼓腹，平底。标本羊草沟 M118：7。

B 型 矮领，圆肩，平底。标本六顶山 M209：1。

盆 大口，平底。均泥质灰陶，轮制。出土于六顶山墓地。依据腹部不同可分两型。

A 型 窄沿外翻，腹微鼓。标本六顶山 M205：01。

B 型 宽沿外卷，圆折腹。标本六顶山 M209：02。

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的其他器形，还有敛口罐、盘、壶、瓶等。他们虽然数量不多，分布区域也不广，但是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近似。

2、分期

由于目前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陶器，没有直接的层位关系，还难以建立独立的期组序列。但就器形来看，墓葬出土陶器的 A 型深腹罐，B 型鼓腹罐，B 型盆等均与遗址出土陶器的同类器近似。这就为墓葬出土陶器的分期提供了依据。具体归纳如下。

1、A I 式深腹罐的形制介于遗址出土的 Aa II 式与 Aa III 式深腹罐之间；A II 式深腹罐的形制介于遗址出土的 Aa III 式与 Aa IV 式深腹罐之间；A III 式深腹罐的形制与遗址出土的 Aa IV 式深腹罐相似；

2、B 型鼓腹罐的形制与遗址出土的 B II 式鼓腹罐相似；

3、B 型盆的形制与遗址出土的 B I 式盆相似。

从以上墓葬与遗址出土同类器的比较，并参照遗址的分段结果，可以把牡丹江流域渤海墓葬出土陶器分为顺序的二段。

第一段：典型器物 A I、B I、C I 式深腹罐。羊草沟 M109、M118、M201、M202、M203、M206，石场沟 M10、M18，北站 M3 均出有 A I 式深腹罐；石场沟 M18 共出有 B I 式深腹罐，羊草沟 M117 共出有 B I、C I 式深腹罐。这些墓葬单位可归属此段。共存的器物有 A 型鼓腹罐和瓶。这一段，器形较为单一，主要是深腹罐，有少量鼓腹罐；绝大部分器物为夹砂褐陶，手制，只有个别器物是泥质陶，轮制。

第二段：典型器物有 A II、A III、B II、B III、C II、C III 式深腹罐。六顶山墓地、虹鳟鱼场墓地的所有墓葬及羊草沟墓地、石场沟墓地、北站墓地、二道河子墓地的大部分墓葬单位均属此段。共存的器物有 B 型鼓腹罐、盆、敛口罐、壶、瓶、盘、碗、钵、器盖等。这一段陶器种类很多，但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深腹罐，其他器类数量有所增加。深腹罐绝大部分为夹砂褐陶，手制，口沿下均有一条凸棱。其他器类中，主要是泥质灰陶器和轮制陶器。

从深腹罐的形制比较来看，墓葬出土陶器的第二段，处于遗址出土陶器的第四段，相当于遗址的第二期即渤海前期。从深腹罐的形制分析看，第二段和第一段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延续性。由此推断，第一段的相对年代大约在遗址出土陶器的第三段，相当于遗址的第一期即渤海建国前后。

D 型深腹罐、瓶、壶、敛口罐等器类与第二段典型器物 A II、A III、B II、C II 式深腹罐共出，同属于第二段；虹鳟鱼场 M2205 共出 A II、A III、C II、D 型深腹罐，壶，敛口罐等；六顶山 M205 共出 A II 式深腹罐和壶；石场沟 M11 共出 B II 式深腹罐和敛口罐。它们与遗址第三期出土的同类器相比，器物的制作风格表现出了很大差异，显示了时间上的差别，也证明了上述分段的合理性。

六顶山墓地贞惠公主墓出有墓碑，可确知其埋葬年代为公元 780 年。六顶山墓地是渤海早期贵

族墓地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其出土器物均处于第二期即渤海前期，这进一步验证了上一章对年代推断的合理性。墓葬的年代集中在渤海初期晚段和渤海前期，丰富了遗址陶器为我们提供的牡丹江流域靺鞨—渤海文化演变序列。

四、结 语

本文通过对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与墓葬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建立起了这一区域较为明确的渤海陶器的分期与编年。

根据遗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将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分为三期。牡丹江流域渤海陶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渤海文化的发展和形成。

渤海政权是以靺鞨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但在它广大的疆域之上，“生活着靺鞨人（这是主体），高句丽人、汉人、契丹人、夫余人，以及少量的其它民族”^[12]，因此，它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政权。渤海文化，继承了靺鞨文化的传统，也接受了高句丽文化的一些影响，后期逐步地乃至相当深刻地融入了唐文化的行列。

在渤海遗址及墓葬中都有大量存在的各种型式的侈口深腹罐（俗称靺鞨罐）是渤海早期的典型器物，在渤海的各个时期都有发现，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和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是渤海国主体民族、主体文化的直接体现，为渤海是靺鞨大氏集团建立的政权提供了考古学的佐证^[13]。

渤海政权的版图，有相当大的地区，如西京鸭绿府、东京龙原府、南京南海府等都是高句丽统治或控制过的地区，粟末靺鞨本身也深受高句丽的影响，而渤海政权的建立也包括了一部分高句丽遗民。因此，渤海政权受到高句丽的影响是很自然的。渤海陶器中所体现的高句丽风格主要是展沿和双横耳。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西周至战国期间，分布于吉林省中部和辽宁省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的部分地区的西团山文化就已经使用横桥状耳陶器，这种陶器制作风格，为西团山文化流行地域内的后起民族，诸如夫余、高句丽等继承。”^[14]

渤海是唐王朝的藩属国，是唐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唐王朝派遣的使臣，不只是政治代表，大部分也都是文化使者，他们把中原的文化传播给渤海。渤海也积极向唐朝学习，大量输入中原的文化典籍，派大批使臣、留学生到唐朝具体学习。其政治制度、统治机构和文物典章“大抵宪象”中原^[15]，一遵唐制。政治和经济上的频繁往来和密切联系，成为推动渤海社会发展的因素，渤海文化深刻地融入了唐文化的行列。渤海遗迹中出土的有明显中原特征的器物，器类很多，如卷沿的鼓腹罐、敛口罐、长颈瓶、盘、三足器、唾壶、器盖等。

综上所述，渤海陶器的各种器形在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这是渤海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结果，但是，渤海陶器的基本风格和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另外，本文所排的相对年代及分期的主要依据是牡丹江流域渤海遗址及墓葬的出土材料，它势必有其地区的局限性。又由于受材料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还存在两个问题未能解决：

1、渤海陶器与靺鞨陶器是一脉相承的，但究竟该怎样区别，还需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本文的“渤海陶器”，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部分靺鞨陶器。

2、在已发表的有关渤海陶器遗存的材料中，基本上不见比较明确、可用以确切断代的文字资料，渤海陶器绝对年代的推定仍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与完善。

（附记：本文是在笔者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论文的写作和本文的修改过程中得到了魏存成教授和王培新教授两位恩师的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原田淑人等. 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M]. 东京: 东亚考古学会, 1939.
- [2] a 阎万章. 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J]. 考古学报, 1956, (2): 69~73.
b 金毓黻. 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的补充[J]. 考古学报, 1956, (2): 75~78.

- c 王承礼. 敦化六顶山渤海墓清理发掘记[J]. 社会科学战线, 1979, (3): 200~210.
- d 王承礼. 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J]. 考古, 1962, (11): 575~580.
- e 黑龙江省博物馆. 牡丹江中下游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 1960, (4): 23~30.
- f 吉林大学历史系敦化文物普查队第二小组. 敦化二十四块石遗址调查记[J]. 吉林大学社科学报, 1958, (8).
- g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六顶山与渤海镇 - 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
- [3] a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桦林石场沟墓地[J]. 北方文物, 1991, (4): 57~66.
- b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海林二道河子渤海墓葬[J]. 北方文物, 1987, (1): 34~37.
- c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海林北站渤海墓试掘[J]. 北方文物, 1987, (1): 32~33.
- d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宁安市虹鳟鱼场墓地的发掘[J]. 考古, 1997, (2): 1~16.
- e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省海林市羊草沟墓地的发掘[J]. 北方文物, 1998, (3): 28~40.
- [4] a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5, (11): 52~61.
- b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渤海上京宫城内房址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 1987, (1): 38~42.
- c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1997年考古发掘收获[J]. 北方文物, 1999, (4): 42~49.
- d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二殿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2000, (11): 13~22.
- e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黑龙江省宁安县石灰场遗址[J]. 北方文物, 1990, (2): 3~10.
- f 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系. 黑龙江海林市渡口遗址的发掘[J]. 考古, 1997, (7): 16~26.
- g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省海林木兰集东遗址[J]. 北方文物, 1996, (2): 23~25.
- h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系. 河口与振兴 - 牡丹江莲花水库发掘报告(一)[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i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系. 1996年海林细鳞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J]. 北方文物, 1997, (4): 43~46.
- [5] a 谭英杰, 孙秀仁, 赵虹光, 干志耿. 黑龙江区域考古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b 金太顺. 渤海墓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考古, 1997, (2): 17~27.
- c 乔梁. 靺鞨陶器分期初探[J]. 北方文物, 1994, (2): 30~41.
- d 孙秉根. 渤海墓葬的类型与分期[A].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188~224.
- e 胡秀杰, 刘晓东. 渤海陶器类型学传承渊源的初步探索[J]. 北方文物, 2001, (4): 37~43.
- f 刘晓东, 胡秀杰. 渤海陶器的分类、分期与传承渊源研究[J]. 北方文物, 2003, (1): 25~38.
- [6] [8] 同[4]h.
- [7] 同[1]、[2]g、[4]。
- [9] 细鳞河遗址发表的材料没有器物号, 石灰场遗址和木兰集东遗址出土陶器均是残片, 因此无法对其进行类型学探讨。
- [10]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360. 新唐书·渤海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180.
- [11] 同[2]c、[2]g、[3]。
- [12] 王承礼. 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56.
- [13] 同[2]c.
- [14] 同[5]f.
- [15] 新唐书·渤海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1~83.

Research into the Typology of Bohai Ceramic From Songhuajiang Valley

Zhang Yu-xia

(Institution of Archaeology, Hen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Henan Zhengzhou 450002)

Abstract: The Bohai state of Tang dynasty was the minority power established by the Mohe tribes of Sumo along with the other Mohe tribe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n ancient China. The excavation and study of the Bohai relic constitute a great academic subject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What the present article offers i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n the pottery from the Bohai relic in the valley of Mudanjiang river as well as a deep-going systematization and study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m. Through the typological study of wares from sites and tombs ,it is expect that the specific historiography and phases can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Bohai state ; The Valley of Mudanjiang river ; Typology

收稿日期: 2005-09-05

作者简介: 张玉霞 (1979 -), 女 (汉族), 河南温县人现工作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